
《從理學到倫理學：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》

黃進興著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13年1月。
455頁。

劉繼堯

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

黃進興（下文簡稱：黃氏）的研究相當廣泛，專著有《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》、《優入聖域：權力、信仰與正當性》、《聖賢與聖徒》、《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》等。論文有 梁啟超的終極關懷、「文本」(text)與「真實」(truth)：試論德希達(Derrida)對傳統史學的衝擊 等，著作甚豐。其研究主要圍繞近世思想史、宗教文化史，及史學理論三大範疇。

關於《從理學到倫理學：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》(下文簡稱：《從理學到倫理學》)，黃氏自言：「『上篇』旨在探索清末民族時期道德意識的轉化，前此所鋪陳思想的課題，均為特殊脈絡所設計的對比背景，美其名則是『理念型態』(ideal type)的手法。職是之故，並非一部近世倫理學史。……『下篇』，收入數篇延續性文章，大多攸關孔廟文化的研究，尤其側重宗教性的議題」。¹可見此書之重點，較有系統論述者為上篇。下篇可視為補充性的散論。故先述下篇。

下篇冠名為「儒教的反思及其他」，共收錄六篇文章：1. 研究儒教的反思、2. 清末民初儒教的「去宗教化」、3. 荀子：

1 黃進興：《從理學到倫理學：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·序言》(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13年1月)，頁3-4。

孔廟從祀的缺席者、4. 蛻變中的「思想史」：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、5. 以序為書：評介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、6. 師門六年記（1977-1983）；二篇附錄：克裡歐的學徒（黃進興口述 / 陳菁霞訪問整理），把握儒教的歷史真實不能僅僅從經典出發（黃進興口述 / 李純一訪問整理）。

首三篇文章圍繞孔廟而展開。在「研究儒教的反思」一文，黃氏開宗明義指出，其研究是通過孔廟來分析儒教的宗教性格，不專注經義的爭論，而是集中於由孔廟所展現的空間實踐。據黃氏之考察，清末以後對「儒教非宗教」這觀點，是基於：一，以傳教士所引入，以救贖靈魂為主旨的基督教作參照，注意其私人宗教特徵，而忽略了儒教的公共宗教性質。二，忽視帝制時期，儒教曾發揮的宗教角色與功能。三，宗教一詞成為貶義，於是希望儒教為非宗教，或予以改造為非宗教。黃氏提出，儒教具有公共宗教性質，但其主要參與者為官員及儒生，有強烈的排他性，是以遠離一般民眾。

黃氏在「清末民初儒教的「去宗教化」」描述了儒教從國家宗教解體為非宗教的過程。這過程存在二條路線，一是借基督教的模式，重構孔教。一是解構孔子的宗教性質，並代之以世俗化的學者專家，所謂反孔子運動，是由科學主義及政治事件所引發。文末，黃氏對現代新儒學的發展感到憂慮。一方面，現代新儒學指出儒學「既內在又超越」的宗教性質，儒學在知識化及學院化。會否回到儒教過去遠離民眾，曲高和寡的時光，與脫離實踐社會。另一方面，現代新儒學雖然指出其宗教性質，但無實踐的宗教之體，成為無處掛搭的精神。

荀子：孔廟從祀的缺席者一文，縱論荀子之歷史地位，自漢代起荀子雖屢受批評，但仍享配孔廟，自明代嘉靖才被罷祀。這代表了從祀的準則，為傳道之儒，即傳理學的孔孟之道，非傳經之儒。直到清代，由於考據學、諸子學和禮學的興起，荀子重新受到注目。可是西學東漸、今古文之爭，批孔運動等事件，使荀子再次成為批評對象。黃氏認為荀子從祀的問題，反映了道統觀的變遷、儒生們對荀學的異解及政治力量的介入。

蛻變中的「思想史」：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 一文，回顧西方「思想史」的歷史，從「思想史」的興起，以及方法論的爭辯，諸如外在理路與內在理路、意識與心理分析、分析與敘述等，黃氏都有扼要的析述。

以序為書：評介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與 師門六年記（1977-1983）均與余英時有關。前文，黃氏指出其師余英時，發前人所未發，書寫了朱熹理學背後的現實關懷，結合文化史與政治史。展現理學對現實的關懷，又非將理學約化為政治問題的延伸。後文，是黃氏在美國求學時，師從余英時及史華慈的記錄。

附錄是兩篇訪談錄，關於黃氏的求學生涯、研究重心，以及對現行學界的意見等。

上篇《從理學到倫理學》共有七章，分別為：第一章「前言」，第二章「理學的黃金時代及其餘蘊」，第三章「理學家的道德觀——以《大學》、《近思錄》與《傳習錄》為例證」，第四章「太平天國的挑戰與義理的再興」，第五章「追求倫理的現代性：梁啟超的『道德革命』及其追隨者」，第六章「清末民初道德意識轉化道德幾點觀察」，第七章「總結」。第一章為前言，交代上篇主旨以及各章大意。

第二章，黃氏扼要地敘述理學的興起過程，以及政治與思想之間的互動。即使到了考據學大盛的清代，理學之影響力仍然不能小觀，道德上依然是宗於理學。黃氏在此章，交代理學成為中國近數百年道德思想的主流。以此為背景，開展從理學到倫理學的過渡。

第三章，黃氏認為《大學》代表了理學家最高的道德綱領，《近思錄》與《傳習錄》為理學兩系的重要文本。理學家之出現，對將聖人的印象從秦漢以後的政治傾向，撥回德性一邊。可是，理學的德性雖具有普遍的意義，但是落入現實倫理便有一定的落差。不過，黃氏認為理學從修身到成德，展現了德性倫理（virtue ethic）的特色。

第四章，黃氏指出中國近代來自內部的浩劫為太平天國。其宗教意義與儒教為敵，引起曾國藩等衛道之士，起而擊之。遂加速了

考據學之式微與理學之再興。不過，這次再興，恍如曇花一現。

第五章，黃氏認為清末清初道德意識的轉化，與現代倫理學科的建立是同步進行。於是，黃氏此章主要論述道德典範的更替，而非個別的道德論點及內容。首先，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梁啟超先登場。黃氏指出梁啟超不再困於理學的道德觀，提出道德革命——新倫理。由於梁啟超重於國與民族，因此帶有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色彩，但已調整了舊的道德觀。稍後的劉師培與蔡元培，前者的《倫理教科書》，後者的《中國倫理學史》是倫理學體制化，成為一門知識的典型例子。《理論教科書》強調心理學與倫理學的關係，為傳統儒學留一席位，同時又引用西方學術，中西倫理之交錯已無法避免，傳統倫理無法自封。蔡元培的《中國倫理學史》類似觀念史，以大量西方哲學的範疇來分析中國的倫理學說。全書以儒家思想作為主線，附以敘述儒學和政體之間的互動。於是，理學轉為知識化，學科化的趨向大定。

第六章，黃氏指出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，是基於道德已非先驗的，天經地義的。同時，公德的概念打破了傳統的藩籬。中國舊有的倫理江河日下，惟有借重西方之倫理學。當中的轉折，是非自發性的，也非傳統道德思維邏輯發展的結果。對於這轉化，黃氏有些考察：一為有意識的嚮善；一為去除形而上學的過程；一為走向以權利為基礎的倫理思想。第七章，為全文總結。

現代儒學發展的困境

余英時在《現代儒學的困境》指出：「（儒學）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」，²又說：「傳統儒學的特色在於它全面安排人間秩序，因此只有通過制度化才能落實。沒有社會實踐的儒學似乎是難以想像的。即使在道德領域內，儒學的真正試金石也只能是在

2 余英時：《現代儒學的困境》，《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2年），頁96。

實踐中所造成的人格，即古人所說的『氣象』或『風範』」。³ 這是余氏儒學遊魂之說。

黃氏為余英時的門生。這一著作，或多或少如其師一樣，流露出其對儒學的發展困境的看法。首先，上編談到從理學到倫理學的轉折。這轉折其中一個特徵是理學的形而上層面褪色，道德本體瓦解。代之而起的是以西方知識系統重新塑造，或剪裁中國傳統道德。理學的關鍵處，在於其建立一套形而上學，為道德尋求一根源，可是這根源在轉入倫理學的過程中消融。現代新儒學雖然重構道德形而上學，但黃氏認為：「新儒家目前猶囿於學界一語，毋乃為空谷足音，其成效有待觀察」。⁴

另一方面，在敘述這轉折時，黃氏提到曾國藩注意實踐，不尚空談，以禮代理，這是由於禮為規範具體事為。黃氏道出以禮代理為晚晴一大思潮。可是，就筆者所知，民國以後，傳統禮法被受批評，理與禮之間的轉換失靈。儒學失去其轉化為日常生活準則，見之於事的管道。

至於下篇，黃氏在下篇收集其關於孔廟的研究，其研究動機之一，是孔廟為儒學思想展現的場景。黃氏言儒學本來有其宗教性質，可是這性質在清末以後開始剝落，從公共宗教轉入私人宗教失敗。另外，儒學之宗教性質，就其參拜孔廟而言，本來是流傳於士大夫之間，與民眾略遠。現代新儒學的發展，使儒學進入學術殿堂的同時，亦同樣使儒學略遠於民眾。

合上下篇而言，黃氏在敘述理學、倫理學及孔廟的同時，表達出其對儒學在現代發展的疑問，實與其師相似。而黃氏之論，可以說是更進一步說明，現代儒學的困境有其淵源，其發展道路亦甚為崎嶇。

3 余英時：《現代儒學的困境》，《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》，頁 100。

4 黃進興：《從理學到倫理學：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》，頁 180。

《從理學到倫理學》所引發的思考

黃氏這部著作，指出一條思想脈絡或趨勢，重點在與理學到倫理學的轉型。依黃氏之考察，理學以道德修養為主，並影響元明清三代，成為儒學之主流。這點應無異議。從理學到倫理學，既是理學的轉型，同時涉及如何闡釋傳統的問題。

由《從理學到倫理學》引發的思考是，如理學為宋以後儒學的主導思想，在近代轉型時，除了與黃氏考察的倫理學，有所交涉外。還有其他方面嗎？

例如以史學著名的柳詒徵（1880–1956），為學生教授中國史學時指出，中國之史學以養德為主，說：「言德不專為治史，而治史之必本於德，則自古已然」，⁵「吾國聖哲深與史學，故以立德為一切基本。必明於此，然後知吾國歷代史家所以重視心術端正之故」。⁶柳詒徵又告誡來者：「學者之先務，不當專求執德而奴史，而惟宜治史以蓄德」。⁷又如錢穆（1895–1990）為研究生上課時說：「說到中國學術全體，自當以儒學為主幹，為中心。史學從經學中衍出，亦即是從儒學中衍出。儒學應有兩大主幹，以為治平之學，一為心性之學。……于心性治平兩面，都知用心，庶可于將來史學前途開出光明」。⁸兩位學者，都將儒學修養之精神，貫注於史學之中。

除史學外，黃氏在《從理學到倫理學》指出，曾國藩師承桐城派，以義理為歸旨。⁹桐城派文以載道之思想，其風流餘韻，至民國時期還有傳人。唐文治（1865–1954）便是一例，其說：「經學者，文字之根荄；理學者文章之府奧，此外史與子集，則皆文苑之精華也」，¹⁰又說：「儒者兼德行文學者也。入孝出弟，窮理盡性，儒之

5 柳詒徵：史統，《國史要義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31頁。

6 柳詒徵：史德，《國史要義》，頁129頁。

7 同上注，頁131頁。

8 錢穆：《中國史學名著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0年），頁273。

9 黃進興：《從理學到倫理學：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》，頁93–94。

10 唐文治：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，收入唐文治著，陸遠編：《大家國學·唐文治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265。

德也；潛研六藝，淹貫古今，儒之學也。德行以為本，文學以為表」。¹¹ 唐文治融理學於文學的思想，非常明顯。唐文治將文章修養德性的思想，付諸實行，編出數種著作，例如《國文大義》、《文學講義》、《國文經緯貫通大義》等。

簡而言之，黃氏旨在探討中國道德意識的轉化，而非專論近世倫理學史。其指出一條由理學至倫理學的脈絡。由此引出的思考是，以道德修養為主體的理學成為儒學主流，其除了轉入倫理學外，尚轉入史學、文學等範圍。如能承襲黃氏之思路，考察理學如何轉向史學與文學。這對於理學在近代轉型的圖像，也許有所裨益。

11 唐文治：《儒行篇大義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三編》卷三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6年），頁15。

